

“脱煤”后路在何方

——山东部分煤炭企业去产能调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多渠道支持企业减轻债务

尽管围绕去产能做了大量工作,但山东最大的煤炭企业——山东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孙世海依然感到,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存在许多困难。“截至去年末,我们有62对拟退出矿井,负债总额超过280亿元,其中贷款等债务超过80亿元,这些债务在矿井退出时无法去掉,且多数贷款都是母体企业担保的,因此企业的债务负担仍然非常沉重。”

“职工自身无动力,内部安置无空间,社会分流无市场,外部创业无保障。”对于现阶段煤矿职工分流安置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山东另一大煤企兖矿集团董事长李希勇如是说。他建议对需要转岗分流的煤炭职工,政府应将其纳入社会就业扶持体系,优先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包括职业培训、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帮助他们尽快转岗。对于技能单一的职工或年龄较大人员,再就业确实比较困难的,建议提供一些公益性岗位帮助他们就业。

让山东能源集团总经理张寿利最感头疼的,是“去产能”安置职工所需的巨额费用:“即使获得国家补贴也不会超过60亿元,但若加上拟退出煤矿的银行贷款,我们的资金缺口将超130亿元!在目前经营困难形势下,企业无力负担如此巨额的职工安置费用。”据张寿利介绍,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奖补资金仅用于支付企业欠发职工工资、欠缴社保费用、解除劳动合同职工的经济补偿、发放提前退养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等,大量需要企业转岗分流的职工在培训和待岗期间没有资金来源。因此,即使获得一定的奖补资金,也难以满足职工安置的资金需要,资金缺口巨大。

对于当前煤炭企业的融资环境,孙世海乐观不起来:“部分银行对煤炭企业采取融资限制措施,导致企业整体融资环境急剧恶化,致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资金压力。”

为此,孙世海建议,应多渠道支持企业减轻债务负担。一是实施债转股。债转股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融资能力,促使企业通过转型发展新项目,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二是息停挂账。实施息停挂账在钢铁等其他行业已有过先例,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可等企业造血能力充沛后再承担债务利息。

“为更好地促进煤炭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企业脱困发展,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对煤炭企业限贷、抽贷、断贷,为企业顺利完成资产重组处置和人员分流安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李位民呼吁。

山东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截至2015年底,共有各类煤矿192处,生产能力1.8亿吨/年,拥有约40多万人的产业大军。当前面对煤炭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山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退出近六成的煤矿,化解三分之一的煤炭产能,分流安置职工约15万人。今年计划退出煤矿58处,占总目标的一半;化解产能1625万吨/年,占总目标的四分之一。

截至8月初,山东已停产煤矿51处,关停产能1425万吨/年,分别占年计划的87.9%和87.7%。煤矿“脱煤”后,职工该怎么安置?企业如何获得新生?记者近日走访了几个煤企,看到各煤炭企业不等不靠,走出了一条自救求生的“山东路径”。

“混改”让企业走出困境

今年6月底,开采了近60年的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埠村煤矿彻底关闭。埠村煤矿曾是淄矿集团第一大矿,经过50多年的开采,优质资源接近枯竭,剩下的煤层含水量高,不仅安全系数低,排水成本也居高不下。

“排水费一年下来要4000万元,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原埠村煤矿副矿长丁守臣介绍说。“2012年以前每吨煤售价是600元,现在煤价‘跌跌不休’,每吨才330元,眼下高水充填成本是每吨545元,差不多是生产1吨就要赔进去215元。”采得越多,赔得越多,2012年至2015年,埠村煤矿累计亏损2.86亿元。“吃煤”的路子走不通了,埠村煤矿痛下决心要换一种“活法”,向非煤产业转变。

“生存是当务之急,如果徒守‘国字号’身份,企业脱困也必将遥遥无期。”由埠村煤矿改制而成的山东新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树新坦言。“我已经变卖家产投资入股,真正与企业融为一体了。”在埠村矿东辰工程塑料公司,厂长于福德对于正在推进的股权改革试点充满期待。现在,以产权改革为纽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正成为埠村矿各经营实体的努力方向。东辰公司曾有2000多名煤矿职工持股,“全员持股”造成“谁都不管”,经营管理层缺乏积极性。去年7月,东辰公司22名经营管理层成员出资对全矿职工持有的35.5%股权进行了置换。管理层收购之后,关键岗位职工与企业利益实现捆绑,创效积极性得到激发,企业实现快速发展。2015年,东辰工程塑料公司完成销售收入7206万元,实现利润292万元,利润增幅同比超过39%。

尝到“混改”的甜头后,新升实业投资1.32亿元增资扩股星化工公司,取得了其60%股权,原本为国有独资公司的城隆建材公司也引入两个民营股东。新升实业工业蓝宝石项目是一个收益高、风险大的项目,他们试行“业主跟投机制”,项目调研组成员先期自筹资金200万元进行产品验证,试验成功后转为股本,并逐步跟投至不低于注册资本的10%;试验不成功,则由项目组成员自行承担。目前,该项目已通过山东能源集团董事会审批,注资1亿元成立山东新升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左图 6月26日下午,埠村煤矿二号井主井口永远地关闭了。

下图 东辰工程塑料公司生产现场。(资料图片)



记者了解到,去年,埠村煤矿8个非煤企业实现利润6824万元;全矿全年实现利润287.2万元,埠村煤矿12年来首次实现盈利。获得“新生”的山东新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正转型发展高端化工、工程塑料、新型建材等多个非煤企业,并向煤炭生产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业进军,8000多名职工,已有7000多人通过转产、转岗等方式平稳有序分流,今年上半年,实现利润2072万元。

“转型越早越主动,不转总被动。”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位民认为,埠村煤矿果断减产、逐步关闭矿井,成功避免了利润被原煤“吃掉”,是一项明智之举。资源枯竭型国企转型既不能“矿关人散”、将矛盾推向社会,也不能走纯粹安置人员、产业发展不可持续的路子,必须统筹兼顾才能实现有责任、有效益的转型。同时,企业还应避免“病急乱投医”而陷入进一步亏损的境地。

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路

“甬管大路小路,只有走出去才会有出路。”下了大半辈子矿井的山东能源龙矿集团洼里煤矿机电工区员工卜庆锐,谈及到河北廊坊承接光伏太阳能安装工程,他感觉最大的收获不是每天额外增加的130元工资,而是观念的改变。“过去是等着‘发工资’,现在是要自己‘挣工资’。”

洼里煤矿1968年筹建,是龙矿集团第一对生产矿井,创造过许多辉煌业绩。近年来,优质资源逐渐枯竭,人员多、煤质差等诸多因素导致煤矿年亏损额最高达6000万元以上。“全矿25个基层单位和部门的1000余人,全部都在‘吃’着井下年产不足50万吨的原煤,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不堪重负。”洼里煤矿财务总监孙磊说,早在2012年,洼里煤矿便开始有节奏地逐步收缩开采,去年5月

该矿正式停止开采。

“作为国有企业,洼里煤矿绝不能走‘人走矿关’的老路。”洼里煤矿党委书记逢中松说。为此,该矿采取“对外开发转移一批、矿井本部留守一批、内部退养安置一批、自主创业分流一批、长伤长病企业承担一批”的人员安置总体方案,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工人后干部统筹平衡的原则,把全矿划分为职能管理、对外托管、承揽工程、技术服务、资源利用等板块,各板块自找市场、自挣工资。

37名洼里矿工远赴吉林桦甸奉泰油页岩公司进行巷道施工,一炮打响。随后,他们组建了6个对外项目部和1个劳务输出作业队外出创业,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与山西、甘肃等省的企业开展合作,相继承揽了13项工程施工任务,年创收2000余万元。尤其在金鼎铁矿巷道浇筑工程中,他们不但以过硬

技术破解各种难题,而且实现工艺创新。“不愧是‘正规军’出身,人品、技术都是一流的,这样的队伍啥时到俺这里来都会有活儿干。”金鼎铁矿巷道施工负责人这样评价他们。

“只要摒弃掉‘等、靠、熬、要’思想,办法总比困难多。”洼里煤矿经营管理部部长于长欣告诉记者,矿区内400多亩草坪改成了“菜园子”,还将两栋闲置“烂尾楼”用来养殖羊、猪等牲畜,在闲置空地上挖了4000多平方米的鱼塘养鱼,一年下来,这些“副业”足可以养活5个井上的所有工人。“端了一辈子铁饭碗,最初得知单位鼓励员工自主创业时,心里一时接受不了,但后来证明只有走出去路才能越走越宽。”女工徐春娜感慨,她在矿上的复垦中心从事鸡、鸭、羊的“绿色养殖”,去年底一次出售红毛公鸡和山羊便收入过万元。

如今,洼里煤矿的1029名在职员工,九成多已经被分流安置和组织外出创业。

调查手记

煤炭产量曾占据山东半壁江山的百年老矿淄矿集团(原淄博矿务局),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11对矿井有7对被注销了生产能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生产经营跌入谷底,被确定为全国36家特困企业之一。当时全局有2300个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就在命悬一线的险恶形势下,淄博矿区的干部职工不等不靠,背水一战,响亮地喊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自筹资金建设济北矿区,逐渐使淄矿起死回生。

而今,淄矿再次站在自救解困的起跑线

阵痛之后是新生

王金虎

但经历过资源枯竭之痛的他们,比谁都懂得一次性能源“可用不可靠”的道理。近年来,淄矿持续培植接续产业,仅埠村煤矿就先后成立了10多家非煤企业,形成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淄矿是一面镜子。面对如今煤炭市场一蹶不振的窘境,山东煤炭企业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不是企业化解落后产能,就是落后产能拖垮企业,去产能不仅是提质增效的重中之重,更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所在。在去产能职工安置工作中,他们始终将维护职工利益、拓展岗位空间放在首要位置,坚持以人

为本、有情操作的原则,避免去产能中将企业“一关了之”,而是靠发展、靠创新解决产能过剩企业的生存问题,解决去产能职工的安置问题。

减是为了增,退是为了进,减负瘦身就是强身健体、增量发展。没有阵痛就没有重生。对煤炭企业而言,去产能工作等不起、拖不起也慢不起,不淘汰落后产能、不压减过剩产能,前无出路,后无退路,必须忍受“壮士断腕”的短期阵痛,换取轻装转型的“浴火重生”。可以说,去产能既是国家政策的刚性要求,也是煤炭产业凤凰涅槃的根本举措。

微调查

河流穿过山川,流经村庄、城镇,受到各种污染,变得浑浊、黑臭。然而,因为一个个“河长”的出现,现在,河流又回到当初的模样。

“河长制”,这个由江苏无锡首创、源于蓝藻暴发的水环境管理制度,由于实施以来效果不错,近些年陆续被国内各地借鉴,安徽、福建、云南、天津、江西等省市纷纷设立“河长”。由此,一个新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河流管理机制,在城乡大地逐渐成长起来。

面对日趋严峻的“水危机”,“河长制”作为呵护清水绿绿的可行探索,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记者近日走访了江西、天津等地,一探究竟。

每一条河流,都是河长们心头的“乡愁”

怎么治理一条河,管好一片湖?江西给出的答案是“河长制”。在这个湿润多水、河网遍布的南方省份,祖祖辈辈的人们都在学着和水打交道,现在,他们对如何治水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作为水乡人,江西省水利厅厅长罗小云认为,“河长制”让每一片需要保护的水域有了责任主体,使原本无人愿管、易受污染的河流,变成了萦绕在“河长”们心头无法放下的“乡愁”。

“从前治水,治理了几十年,年年治,年年反弹。”罗小云说,根本原因在于水环境管理体制不完善。比如江西管辖范围内的河流沟渠,以往有些是省水利厅直接管理,有些由所在市县管理。表面上看是各负其责,但省管河流很多是从市县经过,管辖范围的交界处,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

2015年,江西借鉴其他省市“河长制”管理的经验,开始实行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河长制”,设立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五级“河长”。由省委书记担任省级“总河长”,省长担任省级“副总河长”,其他省领导分别担任赣江、抚河、修河、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省级“河长”。这在我国已实施“河长制”的省市中,

河长制,让每一条河流都荡漾活力

——部分地区创新水环境管理制度调查

本报记者 李华林

覆盖面最广,规格最高,体系最完整。

河流养护落实到党政领导身上,首先解决了原河道水环境管理责任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定点到人,过去可以推的事情,现在责任划分清楚了,推也推不掉。由党政首长来挑水环境管理的头,就是抓住了管理的源头、责任的源头和治污的源头。

江西“河长制”的重点在于防,而位于海河入海口的天津,则主要在于治。“这些年天津工农业快速发展,来自上游和本地的水污染越来越严重,水少、水脏、水流不畅成为严峻挑战。”天津市水务局副局长孙宝双说,黑臭水体之痛唤起了天津的治理决心。2013年,天津在全境内推行“河长制”,目前共有厅局级河长35人,街镇级河长173人。

梁宝双认为,“河长制”能最大限度整合各级党委政府的执行力,弥补多头治水的不足。天津市成立了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下设河长办,建交、财政、环保、国土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治水不再是某一个部门的任务,而是整个天津的大事。

每一位河长,就是每一段河流的“呵护使者”

潮白新河是天津的一条人工行洪河道,水面开阔,风景怡人,最惹人注目的还是河道边竖起的一块河长公示牌,上面写明该河段“河长”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在天津,几乎每一条河流都有这样一张“身份证”。宝坻区水务局局长何建华说,这是为了方便市民监督河流管理。“‘河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负责河道日常管护,群众一旦发现偷排、污染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河长’举报。”

“有问题找‘河长’。”宝坻区宝平街道办事处郭静超对此深有体会,任潮白新河镇街级“河长”不过一年,他已经习惯接到群众的举报,小到发现一张冰棍纸,大到乱排乱放,只要有人指出问题,他就必须协调相关部门给出反应。除了接受群众举报,郭静超还经常到河边转转,发现有人丢了垃圾,马上捡起来带走。“‘河长’不是职务,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他说。

相比于镇街级河长的郭静超,南昌市长郭安肩上的担子更重,他既是南昌市的“副总河长”,也是赣江南昌段“总河长”,对属地河段环境、水质、截污、绿化等负总责。郭安说,有问题要找“河长”,“河长”也要主动啃硬骨头。郭安担任“河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铁腕治砂,协调司法、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整治非法采砂这个困扰赣江多年的痼疾。

事得有人管,管事的人更需要监督。“河长”走马上任后,如何调动他们治水的主动性,避免“河长制”落得一纸空文?天津采用的方法是严格考核与奖惩制度。“河流管理的成果已经纳入各级‘河长’的政绩考核。”梁宝双介绍,天津市采用定期考核、日常抽查、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河道水生态环境管理进行打分,结果每月汇总,年底再通过媒体公示各区考核分数的排名,“晒成绩单”。

其中社会监督是重要的一环。天津市民杨毅是一名上班族,也是海河的义务监督员,他把平常的监督工作总结为“闻、看、察”。“闻水质是否有异味,看河道排水口是否有异常,再观察水的颜色和水利设施。每月20日前给河流治理情况打分。”监督员的分值,是各级“河长”水环境管理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上有考核,下有监督,天津市宝坻区副区长艾玉昆直言“压力山大”。一旦考核成绩不理想,不仅要面临核定资金被扣罚,还会受到



江西靖安县北潦河上,保洁员在打捞垃圾。

本报记者 李华林撰

相关领导的“亲自接见”。在宝坻,年终考核成绩排名后三位的街镇,将被区委书记和区长约谈,督促限期整改。

每一天过去,河流的呼吸都更加清新

在江西宜春市靖安县,古老的北潦河自西向东,从群山中蜿蜒流过。60岁的双溪镇香田村村民熊洪珍在北潦河边生活了半辈子,这几年,她感觉到水环境在慢慢变好。“原来涨一次水,水面上都是垃圾,现在看不到喽。”

水面上都是垃圾,曾经是香田村人关于北潦河的记忆,而这一切随着“河长制”的推行终于有了缓解。2015年靖安县在江西率先启动“河长制”试点,编制了一张覆盖全县河道和水库的“管护网”,聘请200多名专职保洁员,每天定时定点清洁河道,修建垃圾池,投资污水处理厂……“水更清澈了,不少村民开始在河边钓起了鱼。”香田村村主任甘朝勇说。

改变的除了环境,还有人。甘朝勇感慨,

“河长制”影响到了每一个临河而居的百姓。“以前没人管,大家你扔我也扔。现在有‘河长’监管,有巡查员巡视,保洁员每天天下河打捞垃圾,大家也不好意思再乱扔乱排了。”村里人不仅开始约束自己和家人的行为,碰到陌生人向河道扔垃圾也会主动制止。

更深的的影响还在岸上。靖安县水务局局长王仕钦说,“河长制”让考核重心发生调整,环境倒逼的压力使地方自觉地将治污纳入常规,并抓住契机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靖安,凡是可能对河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一律被拒之门外。“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发展旅游业、绿色产业,打造全域有机农业。”

天津也逐步把水作为发展的立足点。以宝坻为例,自2013年以来,宝坻进行污水处理、节水等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累计治理工业企业污染源67家,规模化养殖场113家。天津感官水质异常河道也由此从211公里下降到34公里,环境卫生不达标河道从53公里变为全部达标,综合考评优秀河道从620公里提高到2274公里。